

从宋明理学视域看“浙学”的多元普遍性^{*}

□ 吴 震

内容提要 在当今全球化理论中,地方性文化知识在互为“他者”的前提下,可以得到多元化的发展。“浙学”本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其名称来由或与南宋道学家朱子有关,在其审视下,浙学构成了比落入禅学的“江西之学”更为可怕的“功利之学”。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在12至16世纪的四百年之间,浙学至少有五种不同的形态及其源流,充分表明浙学在传统上便具有多元性特征。然而若从文化发展的视野看,浙学作为地方知识既有地域性又有超越地域的普遍性特征,而这种普遍性并不排斥多元性,因为文化多元性必内含普遍的意义;正是在承认地方文化的多元普遍性的同时,才能更好地促进地方文化的互相学习,因为在具体的差异中才能达到某种共同的肯定和普遍的承诺。

关键词 浙学 浙东学派 地方性 多元普遍性
作者吴震,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上海 200433)

在世界各大“文明”系统中,有种种本土“文化”绵延不息,而“文化”的存在往往带有地域性、特殊性乃至民族性特征,这是当今全球化理论亦不得不直面的现象,因为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各种本土文化趋向同一化或同质化,相反,在互为“他者”、彼此尊重的前提下,全球化可以带来文化多元化的发展。

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看,儒家思想原本作为先秦鲁国的一种地方性文化现象,自孔孟开创以来,经两汉之后的发展演变,特别是随着帝国“大一统”政治体制以及隋唐科举制度的确立,从而使得儒学被纳入国家政教制度当中,获得了跨地域的全国性发展,突破了辽东半岛的地方性知识的局限,具有了遍布各地的全国性特征;另一方面,随着儒家思想义理的不断深入发展,也使得儒学知识带有了普遍性特征,特别是宋代儒学的复兴而发展出“道学”一脉,这种以追寻天道性命之理的义理化儒学形态既有濂洛关闽等地方性特色,

更主要地表现为全域性普遍知识的特征,构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价值及信仰体系,因而又有普遍意义。

在中国学术史上,“浙学”是在两宋道学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学术流派,而浙学作为学术用语,其内涵究为何指,值得探讨。显然,浙学首先是指一种地方性知识传统,然而从今天的眼光看,作为学术史之现象的浙学的地方性是否具有任何普遍性而与全域性普遍知识——如宋代以降主流文化之一的“理学”互不相容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一、“浙学”一名的出现及其丰富内涵

从中国传统学术的角度看,传统学术在历史上不仅只有儒学一家,更有史学及文学的深厚传统,由于文史之学多属一家之言或出自个人之独创,因而带有较强的个人色彩,与国家政教体系存在一定的距离,于是就有较为显著的地方性特色。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成果。

然而,随着唐宋政治经济全国一体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例如印刷技术、科举制度、书院教育的成熟推广,即便个人色彩较浓的文史之学也能在全国范围内得以迅速传播,影响所及就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带有了跨地域的特色。另一方面,在传统中国特别是近世以来,从事文史之学的主体往往就是儒家士大夫,因而在文史传统中不可避免地带有儒家思想的因素,这一点也是不容忽视的。历史上的“浙学”便具有偏重于文史之学的主要特征。

本来,“浙学”属于地域性知识的学术用语,盖指浙江地区的学术文化。“浙江”一名原是钱塘江旧称,以钱塘江为界,又分“上八府”(宁、绍、台等)的浙东地区和“下三府”(杭、嘉、湖)的浙西地区,这类划分大致始于唐宋。然而“浙学”术语的出现却是在传统学术知识日趋全国性发展的历史时期,具体而言,始自南宋,尤为朱子(1130—1200)所喜用,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为“浙学”的思想性质定调:

江西之学只是禅,浙学却专是功利。禅学后来学者摸索一上,无可摸索,自会转去。若功利,则学者习之便可见效,此意甚可忧。^①这是说,浙学的危害性远甚于江西之心学。所谓“江西之学”,是指陆九渊(1139—1193)的心学,而其所谓“浙学”则主要是陈亮(1143—1194)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又称事功之学,显然这是一种狭义上的专指。清人全祖望的说法则完全不同,他指出:“浙学于南宋为极盛,然自东莱(吕祖谦)卒后……皆左袒非朱,右袒非陆,而自为门庭者。”^②其中的“浙学”一词显然在内涵上已发生多重转变,而非专指陈亮事功之学,反映了浙学的源流支脉已呈多元的样态。

不过,在朱子看来,除了永康陈亮以外,金华吕祖谦(1137—1181)开创的“婺学”传统亦属“浙学”一脉,而且对于传承婺学的吕氏后学,朱子的批评竟然未见丝毫的手软,他说:

……浙学尤更丑陋,如潘叔昌、吕子约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当时传授师说何故乖讹便至于此?深可痛恨!^③

其强烈的批评语气,令人侧目。按其上下语脉来看,“其中”代指禅学;里面提到的潘叔昌即潘景愈,字叔昌,为祖谦门人,吕子约则是祖谦弟,即吕祖俭,与朱子亦素有交往。尽管祖谦也算是“浙学”

金华系的领军人物,其生前与朱子乃是挚友,两人曾共同编撰《近思录》,然而依朱子的判断,祖谦一脉流衍至潘、吕之徒却已深陷禅学之泥潭,令人扼腕痛惜。

值得注意的是,在朱子的审视之下,婺学所推崇的司马迁之史学虽然“也说仁义,也说诈力,也用权谋,也用功利”,但归根结底,“其本意却只在于权谋功利”,^④于是,“宗太史公之学”的婺学之本质也就可想而知了。换言之,依朱子的判断,不仅是谈王说霸的永康事功之学沦入功利主义,而且偏重于史学的金华婺学在本质上亦同样掉入功利主义的窠臼而不能自拔。

朱子甚至通过对地方性知识的比较,例如将浙学与江西之学置于比较的视野下,表露出对浙学之注重文史学的倾向有很大不满,以为吕氏婺学之气象狭小而其学术流衍也出现了“四分五裂”的迹象,远不如江西象山心学在“精神”上“能变化人”,朱子指出:

伯恭门徒气宇厌厌,四分五裂,各自为说,久之必至销歇。子静则不然,精神紧峭,其说分明,能变化人,使人旦异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⑤

这充分表明,朱子晚年对于浙学的思想流变不仅非常关注,而且有深入考察,尤其是对其好友祖谦一脉的学术演变,朱子更是忧心忡忡。

此外,朱子还多次使用“浙中”一词,用以泛指浙江。这里仅举一例:

今浙中人只学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浑厚。浑厚是可做便做,不计利害之谓。今浙中人却是计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于可以得利者无不为。……因说东汉事势,士君子欲全身远害,则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遇宦官纵横,如何畏祸不与他理会得!若未免仕,只得辞尊居卑,辞富居贫。若既要为大官,又要避祸,无此理。^⑥

这里的“浙中”,并非特指浙江的某个地区而是概指浙江地域。根据朱子的上述说法,大多数“浙中人”都是些计较利害得失之辈,从而导致这样的严重后果:即一旦在政治上遇到大是大非问题却不敢据理力争而采取“全身远害”的态度。在朱子看来,这就违背了儒家“义利之辨”中对于“义”的坚守立场,从政治上看,士大夫理应以“义”字当头而



绝不允许“得利者无不为”的现象出现,可见,朱子从理学立场出发,对于任何讲求“功利”的思想主张都无法容忍。

其实,在朱子的观念中,所谓“计利害太甚”的说法可能并不是专指“浙学”中事功之学而言,而是泛指“浙学”的一般思想倾向。例如朱子又有一段话可以作证:

近日浙中一项议论,尽是白空撰出,觉全捉摸不着。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地,却要起甚楼台,就上面添一层,又添一层,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实全不济事。^⑦

根据前后语脉来看,这段话原是批评金华吕氏浙东之学注重文史而导致“只守文义”之偏向,但朱子在这里使用的却是“浙中”这个说法,可见在晚年朱子的印象中,浙中之学几乎就等同于整个地方性知识的“浙学”。

与朱子同时及稍后,开始不断出现“浙中之学”或“浙东之学”等称呼,这是对“浙学”更加细化的说法。如朱子弟子陈淳(1159—1223)便有“浙中之学,有陈、吕之别”^⑧的说法,这是分指陈亮和吕祖谦。然而,若以今天的学术史标准来看,应该称作“浙东之学”为宜,可见在陈淳的地域概念当中,“浙中”与“浙东”变得模糊不清。

及至元代,朱子后学吴澄(1249—1333)之弟子苏天爵(1294—1352)则点出了浙东之学具有并重经史的思想特色,他说:

昔宋南迁,浙东之学以多识为主,贯穿经史。^⑨

此所谓“浙东之学”,其实是泛指浙学,不仅是指金华吕氏的文史之学,也包含永康陈亮和永嘉叶适(1150—1223)的事功之学。

那么,在“浙学”这一概念当中,除了金华、永康、永嘉等文史之学及事功之学以外,难道两宋以来的道学传统就不见任何踪迹吗?事实显然不是如此。例如明末儒者茅元仪(1594—1640)在介绍元儒东阳人陈樵(1278—1365)之际,就特别注意浙学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南宋淳熙的道学传统,他指出:

是时(元末)浙东之学,多祖淳熙诸先生。^⑩这个说法虽然简短,但其信息非常明确,值得注意。所谓“淳熙诸先生”,盖指南宋淳熙(1174—1189)年间以朱子、张栻(1133—1180)、吕祖谦“东

南三贤”为代表的道学人物。

很显然,这个说法已经有了学术思想史的意味,换言之,若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角度看,浙学概念不止是专指文史之学或事功之学的狭隘含义,更是指宋代道学整体发展中的一个学术流派。由此可见,朱子用“功利之学”来概称“浙学”不仅属于贬义词,其中内含道学立场的价值判断,而且这一概念所指也有相当的局限性,并不足以反映整个浙学思想的丰富性。事实上,浙学在宋明转型(含元朝)之际的儒者认识中,已经是一个内含丰富、所指多样的地域性知识形态。

若从一个长时段的学术思想史角度看,“浙学”兴起之第一波,即自两宋始而及于元代明初,尤与南宋淳熙道学思潮的兴起不无关联;中晚明时期,阳明心学肇兴于浙江绍兴,然其影响所及则几乎遍及天下,是为“浙学”中兴之第二波;晚明清初至清中叶乾嘉期的黄宗羲、全祖望、万斯同至章学诚,则为浙学发展之第三波。

关于宋明两期的浙学发展,明代中叶归有光(1507—1571)有一个概括,他在承认“浙东学者近岁浸被阳明之教,为致良知之学”的同时,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肯定了浙学渊源的正统性,他说:

浙东道学之盛,盖自宋之季世。何文定公(何基)得黄勉斋(黄幹)之传,其后有王会之(王柏)、金吉父(金履祥)、许益之(许谦),世称为婺之四先生。益之弟子为黄晋卿(黄潛),而宋景濂(宋濂)、王子充(王祯)皆出晋卿之门。高皇帝初定建康……当是时,居礼贤馆,日与密议,浙东儒者皆在。盖国家兴礼乐、定制度,建学养士科举之法,一出于宋儒,其渊源之所自如此。^⑪

这段描述与史实是否完全吻合,当然自可另议,不过就总体看,浙学之渊源与道学密切相关,而且其为学之倾向在于注重经史制度的说法,则基本可信。

总之,由上述三期之发展略可窥见,“浙学”概念所指十分宽泛,以学派言,含道学、心学以及事功之学等,以学术言,有义理之学、经史之学乃至文史之学等,故“浙学”的思想内涵难以获得一个确切的定义,任何企图以某家某派的学术主张来涵盖整个浙学文化的总体特征都有顾此失彼之虞,其因在于以地域之名而统称某段历史时期的



学术思想往往失之笼统故也。因此,有必要将浙学置于宋明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的视域作全盘的审视和了解。

二、从类型学的角度看浙学的多元形态

概而言之,宋明时期浙学思想文化的兴起与流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彼此既有区别又有交集,呈现出多元的形态:

其一,两宋文化的主流非道学莫属,而道学思潮的兴起又与儒家经学的重建有重要关联,由经学开出程朱义理之学,足以代表两宋儒学的最高理论成就,助推儒学复兴亦最为有力,然而宋代儒学却非唯经学一枝独秀,因经学并不足以覆盖两宋文化之全貌。其实,在两宋思想的发展过程中,道学与经史之学已难分轩輊,北宋元丰间有“永嘉九学士”,如刘安节、许景衡、周行己等便大多治经史之学,其中不少士人多与程颐(1033—1107)的伊川洛学有所交结,或直接拜入伊川门下(共有6人),随着宋室南迁而洛学南传,这批传人推动了浙江洛学一脉的发展,而且大多传承有自、脉络可寻,例如两宋之际曾游伊川之门的永嘉周行己(1067—1124)及其弟子郑伯熊(1124—1181)便是其中的杰出领军人物,成为浙学中道学一脉的重要传人。

其二,与注重经典诠释、义理阐发的洛学传统有所不同,由经入史、以史通经的经史交汇之学术趣向在两宋浙学的历史上亦由来有自而绵延不绝,例如以力挽中原文献失传之颓势,重建中原以来的文史传统,构成浙学中注重文史之学以及现实关怀的精神传统,使浙学中以文献传承、史学建构为特长的婺学一脉便构成了南宋文化的一个重要面相,此为金华吕氏为代表之浙学的最大特色。然而在朱子,由于其对史学向有一种偏见,以为非义理之学,故有“伯恭于史分外子细,于经却不甚理会”的批评,甚至有“史甚么学?只是见得浅”^②的极端说法。

其三,宋室南迁,至乾淳年间,道学渐为思想大潮之际,浙学中却有所谓永嘉、永康的“事功之学”异军突起,此两系之浙学代表为陈亮和叶适,他们在思想上的旨趣非常接近,注重实事实学,喜谈王霸、力主事功,浙学中事功学与南传洛学之朱学、江西陆学之心学便在12世纪末的儒学思潮中

恰成鼎足之势。然而,由于事功学被道学家贬为“功利之学”,故在宋明时代的思想史上却始终处在边缘的境地。当然,为学旨趣虽然各异,然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不仅永嘉叶适,而且立场与事功学相近的温州陈傅良(1137—1203)在政治上与朱子同气相求,竟同被列为“庆元党人”而遭封杀,此亦不可视而不见。

其四,自宋末至明初,浙学中特别是“北山四先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为朱学传人,构成浙学“金华”一系的朱子后学,盖其四人于推动朱子学贡献尤大,然此四人均非墨守朱学者,既与吕氏婺学时有交结,又在思想上关注道德性命之理论追寻的同时,推重经史制度、着力于文史之学,及至明初则有金华宋濂(1310—1381)、义乌王祎(1322—1373)等相继而起,复传朱子义理学之同时,并对吕氏文史学以及浙东事功学的学术亦有汲取,其为学主张经史并重而并未偏于性命义理之说。这从一个侧面表明朱子一脉的性命义理之学在元明以降已渐呈后劲乏力之现象。

其五,当淳熙年间道学复振之际,除东南三贤(朱子、张栻、吕祖谦)外,江西陆九渊独创心学,此即被朱子贬为其思想已滑入禅学的“江西之学”,而陆氏门下有四明杨简、舒璘、沈焕、袁燮等四人,史称“甬上四先生”,于南宋末年将心学传至浙江,在四明一带构成了心学发展的重要一支,尤其是得心学真传的杨简(1141—1226)的著述在明中叶经心学家的整理而得以出版,使其思想在学界重新出场而掀起了一场小小的思想波澜,拥护者与批判者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此可见江西象山学与四明系心学余波与明代中晚期心学思潮也有间接或直接的关联,而浙学传统中心学一系对于儒家心性学之发展确有重要贡献,诚为不可忽略之现象。

以上五种形态只是一种大致的概括和划分,并不能穷尽浙学思想的全貌,倘若将视野再往前延伸,那么,11世纪的“浙西”(以嘉湖杭地域为主)地区的学术领袖人物胡瑗(993—1059)虽非“浙中人”出身,然其在浙西湖州的思想活动对于道学思潮有重要的助推作用,恐怕也可纳入非“浙中人”而在浙江产出的重要思想成果而纳入“浙学”的范畴内来加以审视,若往后延伸至明清时代乃至近代的话,那么浙学在思想、学术、文化、教育



等各领域所涌现的重要人物及其成就更显得丰富多彩、落叶缤纷。

三、对浙东学派研究的一个反省

由上可见,自朱子开始频繁使用“浙学”概念以来,一个地域性知识传统似乎被重构了出来,然而仔细回顾和考察 12 至 16 世纪这段近四百年的浙江地域学术史(17 世纪以降的明清时代暂且不论),我们便会发现所谓“浙学”似乎并没有一以贯之的一个固有传统,我们多看到的几乎是盘根错节的各种观点主张及学术现象,例如上面没有提到的金华唐仲友(1136—1188),尽管由于受到朱子的严厉弹劾而导致他在此后的学术史上几乎被抹杀,然而其思想趋向亦与浙学相近,著有《帝王经世图谱》(今存)等重要著作,倡导经制之学,在学术上自成一家,自应引起重视。要之,南宋以来的浙学既有历史文脉的传衍乃至转化等迹象,又有各派的观点分歧或思想异趣,若要从中获取浙学传统的整体认知乃至提炼出浙学的内在规定性几乎是不切实际亦无必要的奢望。所以陈来有一个说法:“对‘浙学’的肯定不必追求一个始终不变的特定学术规定性”,^⑩这应当是不刊之论。

在中国历史上,表彰乡贤的传统由来甚久。早在上世纪初,曾经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着手开辟浙东学派研究之领域,他接受过近代西方史学的严格训练,1917 年回国后便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而其出身其实就是金华人。他对自身的乡贤传统浙学开始发愿进行史学整理则在上世纪 20 年代,他致力于浙学思想源流的爬梳,并从诸多蛛丝马迹的学术史材料中掘发出一个大秘密:发现宋代程颐的伊川之学不仅构成南宋儒学的正宗,而且其流衍所至转化出经史之学,俨然是“浙东学派的宗主”,而南宋朱子由于不契浙学经史并重之趣向,故朱子思想反而沦为南宋儒学的旁支末流,此说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然而平心而论,这种历史的重构过于冒险,沦为一种史学的假设,其因在于对两宋以降的思想文化缺乏内在的义理判断所致。

不仅如此,他还为道学家“至诟浙学为知有史迁而不知有孔子”^⑪的批评愤愤不平,竭力从浙学的历史轨迹中寻找某种固有的思想特质,以为宋代“哲学”(引者按,实指道学)之兴,盖由程颐所创

“由经入史”之新途所致,浙学则因经史并重而对伊川洛学之“哲学”有发扬光大之功,只是明初浙学由于出现了“由史入文”的转向,从而导致浙东之学的衰落。^⑫在近代史学上,何氏所论“浙学”自有开创之功,然其言唯见浙学门派之流变而未见浙学思想之实际,或对浙学中义理之学的判断不免失之偏颇,值得今人从事浙学研究者的反省。

为什么需要反省呢?因为事实上,“浙学”一词可有广狭两义的理解,从狭义上看,专指南宋乾淳之际的浙学三支:吕祖谦的性命之学、陈亮的事功之学以及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此为清代全祖望(1705—1755)之说,^⑬而其说盖源自明初杨维桢(1296—1370)为宋濂文集《翰苑集》所作的一篇序文,只是杨在文中特意强调上述三氏之学“各自造一家,皆出于实践而取信于后之人,而无疑者也”。^⑭这里用“实践”一词来概括“自造一家”的各支浙学流脉之共同特征,值得注意,但是这个说法不免笼统,如同后世学者往往采用“经世”一词来涵盖浙学之总体特征一般,似乎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就缺乏“实践”之精神或“经世”之理想,显然,这并不符合事实。另一方面,若从广义上看,浙学更应包含道学一脉的洛学传统以及心学传统。故浙学不仅内含史学、经学与制度之学,更有“性学”(杨维桢语)与心学的思想传统,既有朱子后学又有象山后学的传承流变,各种浙学流派之间既有彼此交错又有互相批评、各成一家以致学术思想南辕北辙等现象,呈现出浙学思想趣向的复杂性、多元化特征。

也正由此,若以功利之学概括浙学的思想趋向(如朱子)或以史学涵盖浙学的学术特征(如章学诚)或以洛学定位浙学的思想性格(如何炳松),都不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遗患,不足为取。以上我们以何炳松的研究为例,意在说明一个观点:任何试图为浙学思想建立一套井然有序的“谱系”观念或系统都必须慎之又慎;与其如此,我们不如采取文化多元的立场,从整体上肯定浙学思想的多样性以避免掉入“取学派为说以捐偏党之见”^⑮的窠臼。

结语：在具体的差异中寻求共同的肯定

总之,从一个纵览全局的观点来看,一方面,两宋以来经济文化中心的迅速南移推动了浙学的





文化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儒家文化的全国性推广也促进了浙学的多元化拓展。因此,浙学既是一种严格意义的地方性知识,同时也随着非浙江出身的士人阶层的广泛流动而导致他们在浙江产出的思想带有了其他地域的知识特征。例如就宋明思想的全局看,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很难以地域知识来局限,因为洛、闽之程朱与赣、浙之陆王的思想展开在宋明时代已呈跨地域的态势。

同样的道理,浙学虽发源于两浙地域,然其学术思想的多元性格表明浙学也必有跨地域的普遍性意义,犹如儒家语言所构成的知识是特殊的,然儒学思想所表现的理趣却有普遍性那样,浙学既是地方性知识,因而具有多元性样态,同时在多元性的思想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某种跨地域的普遍性特征,构成了地域文化的多元普遍性;反过来说,儒学普遍性需要地域性、多元性等文化资源才能呈现。从这个角度看,承认浙学是一种地方知识并不是矮化自己,也绝不是主张浙学具有排他主义的特殊性,而是在承认地方文化差异性、多元性的同时,能够更好地促进不同地域文化间的互相学习,因为正是在具体的差异中才能达到某种共同的肯定和普遍的承诺,才能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注释:

①《朱子语类》卷一二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67页。

②《宋元学案》卷五十三《止斋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724页。

③《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以下简称《朱子文集》)卷五十《答程正思》第16书,载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祥主编

《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7~2328页。

④⑤⑥⑦⑧《朱子语类》卷一二二,第2952、2956、2958、2958、2950页。

⑨陈淳:《北溪大全集》卷三十三《答西蜀史杜诸友序文》,《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页。

⑩苏天爵:《滋溪文稿》卷九《袁文清公墓志铭》,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37页。

⑪茅元仪:《暇老斋杂记》卷十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29册,第548页。

⑫《震川先生集》卷九《送狄承式青田教谕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9~210页。

⑬陈来:《事与心——浙学的精神维度·序》,载何俊《事与心——浙学的精神维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⑭这大概是指朱子对婺学的一句批评:“婺州士友只流从祖宗故事与史传一边去。其驰外之失,不知病在不曾于《论语》上加工。”见《朱子语类》卷一二二,第2956页。

⑮以上参见何炳松《浙东学派溯源·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页。据其“自序”,他的上述见解最早创发于1928年在上海中国公学史学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浙东学派溯源》则出版于1932年。

⑯《宋元学案》卷六十《说斋学案序》,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54页。

⑰杨维桢:《翰苑集序》,载宋濂《宋学士文集》卷首,《四部丛刊》本,第2~3页。

⑱金毓黻:《中国史学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原刊于1938年),第252页。顺便一提,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引金氏此说,进而否定章学诚《浙东学术》一文所谓的“浙东学派”之概念,认为章对浙东之学的判断大多“缺乏历史根据”而另有复杂的“心理背景”(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版,第59~72页)。这是值得重视的论断。

责任编辑 刘 洋